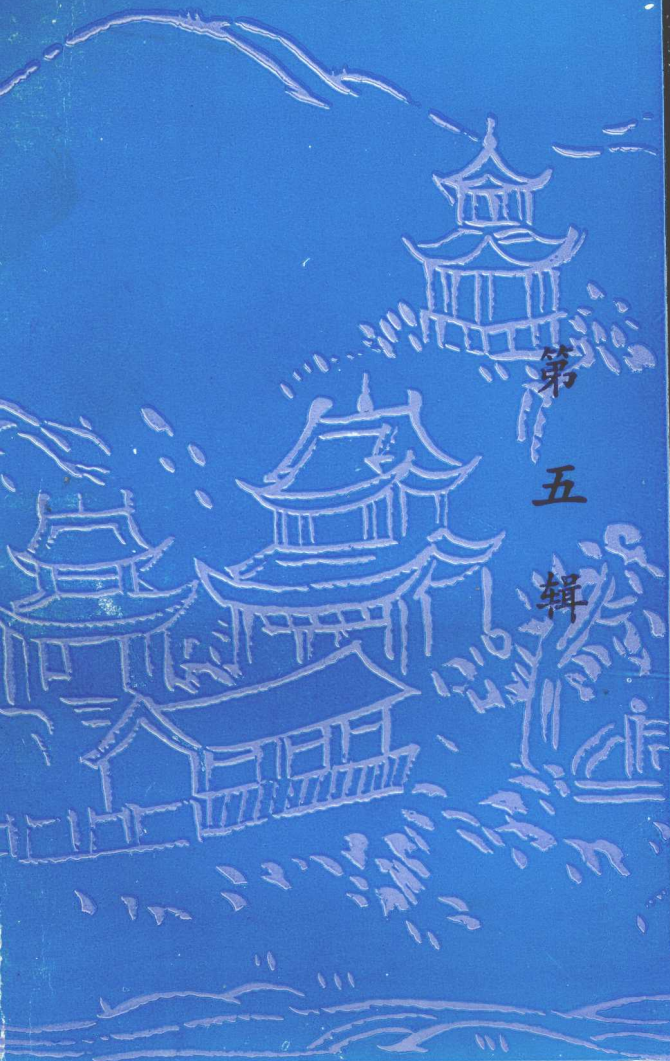


永城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永胜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八月

责任编辑:陈 武 叶云龙 谷林祥

主 编:赵文贤

副 主 编:李 伟

编 辑:曾必孟 谭汝寿 徐 鲤

吴锦福 张忠贞

封面设计:刘晓雁

目 录

历史纪实

- 中所洪灾侧记..... 王品乙(1)
- 民国匪患拾录..... 李 樾(6)
- 永北史料三则 谭汝寿(11)
- 永北土司高氏世系简介 拓 野(16)

文化教育

- 永胜县民族民间器乐简介 刘志昌(23)
- 永胜文物二则 张顺彩(26)
- 单氏楹联辑注 雷声谱(29)
- 高玉柱作品简介 李 伟(40)
- 凤凰山记 徐抡元(45)
- 名医汤耀南六十寿辰序文 徐抡元(47)

名物风情

- 土家人风情录 简良开(50)

永胜境内金沙江主要古渡	曾必孟(55)
永胜古驿铺	曾必孟(57)
金江水文站	曾必孟(60)

经济纵横

永胜林业建设四十年	政协文史办整理(62)
-----------------	-------------

人物春秋

王成中之死	谭汝寿(76)
关防箐四烈士	谭汝寿(79)

政治军事

永胜人民武装后备军建设历程	政协文史办整理(82)
争取余海清的工作回忆	胡 丹 (97)
永胜人民法院历程	政协文史办整理(109)
旅程记事三则	谭经元(116)
一支永胜彝族革命武装	甘仁 李后庭(126)
丽江地委民族工作队赴小凉山开展民族工作的回忆	马继典(136)
政协永胜县委员会简介	李 伟(147)

中所洪灾侧记

王品乙

清光绪三年(1877年),8月12日,一场洪灾突降,期纳中所全村毁于一旦。

据前辈说,中所原是从南到北的一条小街,共有七姓人:张、王、周、尹、马、刘、姚,计36户,187口人。那年,从八月初一起,绵绵秋雨,日夜下个不停。初九那天,有个披蓑衣戴斗笠的苦荞坪人来说,他们下边箐口积着一大塘洪水,恐生洪灾,叫村民预防。但听到者没有当作一回事。12日,天气转阴。村民尹和结婚,有满官亲戚王成周前来作客,晚间主人摆赌迎客,尹父借两吊铜钱给王成周,但他不敢借用,输光身上带的钱便回满官去了。晚上十点左右下起了大雨,到第二日天刚亮,就有亲戚谭某敲门来说:“中所被水冲了,你们是中所王家的亲人,还不赶快去看看啊!”于是,全家老幼哭喊着跑到中所一看:房屋冲塌,树倒畜亡,泥沙淤积漫流,一派凄惨景象!

这场洪灾劫难,据王成周父子计算,王氏亲属冲去了72人。骨肉情深,能不使人心胆俱寒!当时外地亲属到中所探看的不知有多少,真是人人伤心,个个悲痛!在这次洪灾惨劫中,张、王二姓幸免于难的只有几口人丁。

那晚,正逢王小二媳妇生孩子,把胎衣送往房后,正遇

洪水冲到，冲来的石头垒起一个大石堆，水就由两边分流而去，保住了那所房子。房屋现在虽经重修，老屋架至今还在着。就在王小二媳妇产后，洪水漫街了。人们哭喊着乱成一团。王小二想求生抛下母亲、妻子与孩子冒险探水出逃，却首先被洪水卷走了！婆媳孩子三个倒活了下来。

再就是张家。前辈人常说：“打不死的陈天精。冲不死的张德泽。”张七大爷在洪灾中是死中得活的唯一的人。他是举人张廷楷的后代，是中所有名的富户，暴雨狂袭时，全街老小乱成一窝蜂。有的青年跑到他家求办法，他叫来人辟明子扎火把，爬上屋顶看水势。但，这时水冲进街了，外边震天动地的哭喊声压过了洪水声，正扎火把的人一哄而散，跑回家顾老小去了。他家里的老婆、嫂嫂拉着三个小孩抱头痛哭。他本人急得团团转，只好束手待毙了。忽听上街屋墙的倒塌声，在这生死关头无法可想，只好同老婆、嫂嫂把三个孩子扯到背上，奔上花园楼。此时，两个长工和一个表侄也赶上楼来。他们急中生智，把厩上的枋匹抬出来，等水冲到时各人抱着一匹逃生。他们又用大囤箩，将三个小孩放在里面，装上些食品说：“有命漂起走，无救也没法。”嫂嫂哭着说：“冲死不如压死在家里算了。”老婆说：“后死不如先死，全家不如跳水死。”一家人正哭喊惊慌，洪水已将周围的房屋冲垮了，飞溅的泥水打在身上，他们只得紧抱枋匹，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了！

此时，只听“轰”地一声巨响，花园楼房已被冲倒。张七大爷死死抱着枋匹，在洪水泥沙里翻滚、随泥流冲走。后来，撞在一棵冲倒在水中的大青皮树上挡住了。他急忙放开枋匹抱紧树干。不久，东方发白了，泥水也渐渐分散流淌，树也

慢慢停住了。但，他后边的泥流还是冲来，沙泥越堆越高，终于把他裹在泥沙里，他身软头旋，无力挣扎，只好在泥沙里半生不死地喘息着。后来，捞浪水柴的发现他，才从泥沙里把他挖起来。人们在急救他时，发现他衣袋里有些银两，又见他手上戴着一只大玉圈，就知道是中所的张七大爷。立即为他擦洗换衣。恰在这时，他姑妈的儿子高名扬带着四个人骑马赶来了。见状立即将他送去急救。高名扬说：“张七大爷是他的亲血表，他的哥张二大爷为给姑妈拜生日，还留在习朗我家，才免此难。今早听到受灾情况，已气瘫在我家里。”他请大家扎了付担架，将张七大爷送往习朗家中，让他们弟兄相聚。

这次洪灾劫难后的几天，还有很多寻尸找体的人，顺江沿河哭上哭下，惨不忍闻！

尹和结婚时，送亲的人就有一桌，都遭上“送亲送死送下河”的悲惨命运！后来，乡里还流传着：“尹和新婚并未合，当夜遭灾下了河。阳间结婚阴间合”的顺口溜。

再说张七大爷当时把三个小侄儿放在囤箩里，那夜囤箩随泥流漂走，听说14日早晨曾有人发现这个囤箩在漩水湾里打圈子，曾有人用捞浪水柴的钓钩把箩钩住拉，但，猛然冲来一截木干一撞，囤箩被冲倒了，小孩也跌入水中被冲走，岸上人捶胸蹬足毫无办法！不久，张二大爷听了这件事，又气又痛心，后就瘫痪了。

后来，永北直隶厅上本奏报灾情。十月下旬，云南制台亲临勘查。期纳当事人便赶到习朗，通知张七大爷到乡约办事处商量迎接制台及汇报灾情。张、王二姓是中所的主要灾民。此刻，正集民工赶修道路，由金江分佐官指挥，直隶厅的

官员三天前就去接制台。次日人报：制台大老爷就要到了，就忙在期纳街外摆设香案，官绅士庶全去迎接。先是厅官到来下轿，分佐官拜接。厅官细问迎接制台事是否办妥。不久，就见前面海龙旗迎风飘过来。这时，厅官、佐官在前，灾民士庶等随后全部跪好，三声炮响后，就见四行平行的兵勇，穿号褂，打黑布绑腿，带着兵器头排两边，中间两个擎大旗，后跟吹号、打鼓的列队。制台的大轿在中，轿两边二名武勇扶轿而行，都戴红顶；连抬轿的八人都头戴玉蓝色顶帽，煞是威风！大轿后还跟着些坐轿的，骑马的。大轿一到香案前，传令官（即扶轿的那两人）就大声叫道：“百姓闪开，不得喧哗！”此时护兵分站轿前两边，制台才缓缓下轿。

只见他面色红润，墨须飘逸，头戴红缨红顶东帽，身着官服外套黄马褂，脚穿粉底黑绒靴，好一派大员的派头！当时由厅官引道，先至住处安息。

第二天上午约十点左右，前呼后拥把制台大人抬到中所河边视查，制台一下轿，灾民就围跪在他的面前，哭诉灾情，恳求恩抚。制台朗声说道：“本台到此亲查灾情，定不负民众所望，表奏朝廷后，可沐皇恩。”这时，传令官令灾民远退十丈以外，以便制台大人查看灾情。制台大人带着厅官众员，前后左右细细查看，后即上轿，由厅官陪同上永北城去了。

制台走后，留下一员专办官，处理灾情后事。第二天，专办官带着王成周等乡民，下查到金江下河口，上查至灾源地苦莽坪。（灾民曾上诉告苦莽坪巴、海二家，说洪灾的造成，是他们砍火山，开山地破坏了山林，木石堵塞水路，积水成灾。）查后，贴示《告灾民书》，大意是：叫受灾的直系，旁系血

民国匪患拾录

李 樾

(一)朱石宝起事

朱石宝，永胜江外坪上石嘴人，一字不识。十五、六岁时帮金江街乐开元当马童。有事外出，乐开元以骑代步，要朱石宝随马快跑，若落在后边，便受责打。天长日久，倒使朱石宝练得脚上功夫。金江街上，有聂玉堂家开的一片酒铺。朱石宝生性凶横，嗜酒，常到聂玉堂酒铺喝酒，拖欠酒钱，时不时地免不了挨聂妻的臭骂。

几年后，朱石宝邀约几个同伙，在上下江一带行劫过往客商。当时有国民党军队的一群散兵游勇由一个姓王的连长带着到江外坪。朱石宝从他们手中购得武器。于是成了配备精良武器的数十人的匪首。1922年9月的一个集市的早晨，当金江街渡船划到江对岸时，被朱石宝股匪劫持划过江来，集市上的人被吓得四散奔逃。金江街本来有一个江防队，也吓得仓惶逃跑。朱石宝带着喽啰冲到街上首先就把乐开元的房子和聂玉堂的房子一齐烧掉。随后派得八个匪徒顺江而下，到新庄村碰上包锅头(外号)、阮甲爷、黄文灿，便把他们捆起带走。到张来村又抓着刘映祖、白汝玉二人。

刘映祖家很穷，仅有紧靠大路的茅房一所。匪徒到冷水田村闯进小学校里碰上赵金诚、赵金声、赵和邦、赵金品等四个学生。赵金诚机灵，见匪徒进来，一看阵势不对，便说：“几位请坐，我去拿烟。”就跑出大门躲进蔗田里。其他三人被抓住。到涛源村，又抓着黎藩、刘仲。至此这八个匪徒共捆得十人，这是“绑票”，匪语谓之曰“捆肥猪”。最后，这些匪徒过江强住上船处刘硕卿的一所马店里，以便监视渡口。时间已是午后了。

黄、姓匪徒见谷甲河、丁去回等匪徒、黄洞小、刘、张来村刘、白两家当即筹款，请刘映祖的外祖父李植当晚带了财物过江去见朱石宝，请求释放他们。新庄的二阮和黄文灿，因家贫无力筹款，只好听任匪徒去处置了。当李植过江到朱石宝住地时，已是傍晚，朱石宝和喽啰们正大摆酒宴庆功。李植央求朱石宝说：“报告大队长，我是要求大队长施恩，把刘映祖、白汝玉放回家。刘映祖正在读书，又是独苗，他家请我带银元三百元、白家的二百元，共五百元孝敬孝敬大队长，聊备一场辛苦的烟茶之用，万望大队长施恩放了他们。”朱石宝说：“带来的东西搁下，等我们饭吃了再说。”谁知到他们酒醉饭饱之时，金江街这边的江防队突然对准江外坪放了几枪。朱石宝霍地钻起身来怒气冲冲大声吼道：“他妈的，几个龟儿子，狗屎丘八，竟敢放马后炮来骗老子，老子要给你们一点厉害看看。弟兄们你们每人带一个毛子（人质）押到江边全抹（杀）了！”李植见事不好，唰的一下扑跪到朱石宝面前。旁边站着的一个持枪的匪徒吼道：“老头你少啰嗦！”顺手照李植的头上一戳，把他的耳朵戳缺了，顿时鲜血直流昏晕过去。刘映祖等人被押解到江边上船处沙滩上，面向对岸的土主庙跪下，匪徒们每人一个，抽

出长刀，掰起他们的下巴骨，如杀羊一样，抹成大门。他们顿时全都倒在血泊中。一个小匪徒对朱石宝说：“我也给我杀一个玩一下。”朱石宝向院坝里扫了一眼，说：“那角落里有一个，你快解出去和他们一起抹了。”那小匪徒兴冲冲地把阮甲爷解往杀场。小匪徒看到血泊中东倒西歪的尸体，不觉神经一下紧张起来，忙不及喊声跪下，便抽刀往头的侧面乱砍一刀。这一刀用力不大，仅把耳尖砍掉、头皮砍破而已。小匪徒飞跑地转回去了。阮甲爷后来遇救。黄文灿因在头一年去朵美赌钱，帮助过一个重病在床的赌友，而这个赌友这时正好在朱石宝手下当帮凶，见黄文灿被解到，便向朱石宝说：“这姓黄的是我过去的救命恩人，请求队长释放他。”黄文灿因得生还。

赵金声、赵金品和赵和邦的家人得知他们被绑票的消息后，很快准备财物去请涛源村朱维仪过江去赎。朱维仪一见朱石宝便说：“我是涛源朱维仪，赵家请我来向你请求释放赵金声他们三个，并带来一点薄礼。想你我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难写两个朱字，我说嘛，我们朱家早晚是要出你这样的能人哇。”几句话说在了朱石宝的心坎上，便同他认起家门来，并把赵金声三人亲手交给他带回。

朱石宝把捉来的人处理后，集合喽啰赶到上六卜塘村，又把乐开元在那里的房子烧掉，连夜上山去了。第二天清早，李植到杀人场上，看见刘映祖、白汝玉、包锅头、黎藩、刘仲等人惨遭杀害，个个是大开门的倒在血泊中。人财两空，万般无奈，只得忍恸领尸雇船运回安埋。

二、“飞鸡”招安经过

“飞鸡”是股匪头目飞开翼的山号。当土匪的，尤其是匪首，都要起个山号。据说飞开翼是华坪县人，他经常以鸡足山作为落脚出沒的窝巢。与他同时，在漾碧出沒的势力比他大的张结巴，山号“地蜈蚣”，是一个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的匪首，据说此匪嗜吃人肝，残忍成性，不知被他残害了多少黎民百姓。传闻被他劫杀过的地方，小孩哭闹时，只要大人说一声“张结巴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但不知何故，张结巴却认为“飞鸡”是他的克星，所以“飞鸡”在的地方，他就闻风远避。因此永胜、宾川一带倒还避免了张结巴的劫杀。

一九二六年，罗树昌住永时，他想打下长久的基础，增强力量，就一面在县城招兵，一面派人到鸡足山招安“飞鸡”过江驻涛源。“飞鸡”的总部住涛源东头柳彩章家。有人今天请他去喝酒，明天请他去赴宴。出则前呼后拥，进则娇妻相迎，真是春风得意。那时，各地风行码头，“飞鸡”在涛源金山寺召开码头大会，金江“金荣社”各层次人员都参加了。他们这个帮会组织，第一把手是龙头大爷，其次是当家三爷，管事五爷、行封六爷；被排斥不能入会的无业游民、戏子、吹鼓手、装烟倒茶供使唤的人。

“飞鸡”手下的得力干将杨培高，系清邑人。一次回家时，南街富绅阮玉卿请他吃饭。阮玉卿在金江有十数亩好田，有人早已垂涎这些田产，使趁机去向“飞鸡”告密，说杨培高与阮玉卿有密谋活动。“飞鸡”听了顿起疑心，一面派人监视杨培高，一面派人到清邑把阮玉卿捆到涛源审讯。阮玉卿是有钱人怕事，没法转环，暗托人捎信请他在新庄的族人阮珍出面为他活动。阮珍卖了他在金江的十多亩田地，凑足

一千银元送给“飞鸡”，阮玉卿才得以脱身。“飞鸡”得了这分横财，因分赃不平激怒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将“过山号”与杨培高等人，他们真的暗中联络，伺机刺杀“飞鸡”。谁知事泄被“飞鸡”知觉，他马上把杨培高叫到面前，二话没说，抽出手枪对准杨培高的脑袋连放三响，把他打死在柳家院中。“过山号”情知不妙，悄悄逃走了。事出不久，罗树昌命令“飞鸡”星夜赶往永城、再赴华坪，飞鸡只得从命，丢下妻室，赶到华坪落鸡田被手下人刺杀丧生。这跟张伯群（张汝骥字伯禽）到永北被擒一样也被人们议论得神秘兮兮。实际上不过是他手下人利用地名制造杀他的口实罢了。

永北史料三则

谭汝寿

一、“常平仓”与“社仓”

常平仓，最早始于汉宣帝时期，清朝初年，在永北府城区以及片角、金江、期纳、中州都有设置。粮价下跌时，官府以高出市价的价格收购，粮价看涨时，官府又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它起着平衡粮价、稳定市场、从而稳定社会的作用。

社仓是以村、乡为单位设置的，主要作用是“供农民种籽之需”，饥荒时也可“出借穷民”，秋收后“加一还仓，小欠免”，“出陈入新，每石取息一斗”。“公举本乡敦重善良之人”进行管理。

制度本来是好的。但各管理权落在劣绅痞棍手中，无非是给他们增开了一条扰民渔利的门路而已。一纸“务期便民”的条例，是约束不住他们的。随着清朝政治的日趋腐败，常平仓与社仓均难以为继，到光绪年间只好废除。

二、“盐价奇昂”“民多淡食”

盐是任何人都离不开的。故清政府把盐课视为一项主要的财政收入,比田赋、丁赋还控制得紧。先只准在城内、中州、顺州、清邑、金江、片角设六个盐店统一销售,到乾隆十八年(1758年)只准城内设一店、乡村设二店销售,后经永北厅呈文请求,才又准六店分售。

原先永北厅所属乡镇食用的井盐只能从姚州白盐井进货,至嘉庆五年(1800年)才“奏准灶煎灶卖、民运民销,不拘进口”,这样弥沙、乔后、云龙等井盐才得以经人背马驮贩至永北。

永北不产盐,官府又控制得这么紧,再加运输条件有限,故“盐价奇昂”。被称为“盛世”的康熙时期,每百斤盐价为白银二两五钱到四两五钱之间,光绪年间每百斤盐竟需白银七、八两,乾隆年间盐价较低,每百斤盐价在三两白银上下。就以每百斤盐三两白银计,乾隆十四年(1749年)永北厅一个衙役每月发伙食费白银五钱,大约只够买十七斤井盐。至于广大贫苦百姓吃盐不易也就可想而知。所以,前人记述“民多淡食”、“惨状难以笔书”绝无虚言。